

語言與文化

澳門跨文化傳意¹中的幾個問題^{*}

盛炎^{**}

澳門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是中國通向八十多個拉丁語族國家和地區的橋樑。澳門社會是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是一個語言、文化寶庫，是研究語言、文化接觸現象的少有的理想地方。

據1991年政府統計，澳門總人口為355,693人，其中95%是中國人，3%是葡國人，其他國家的人佔2%。澳門社會的主要社群有三個：華人社群、葡人社群和介乎兩者之間的土生葡人社群。澳門的語言多姿多彩，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中文、葡文和英文。中文有普通話和粵語之分，而漢字又有正體字（繁體字）和簡體字之分。有人說，香港是“三語兩文”。雖然概括得不太準確，但基本上反映了香港語言文字的現狀。跟香港比較起來，澳門的語言狀況更為複雜，因為又多出了一個葡文。

一、單文化還是雙文化？

文化是生活方式，是人們賴以生存、思維、感知和相互交往的背景，是把一個特定的人類群體“黏合”在一起的“黏合劑”。文化包括語言、信念、思維模式、處世

* 本文是1996年1月6日至1月7日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語言與傳意”國際研討會的講稿。

** 北京語言學院副教授、澳門理工學院中文課程主任

1. “跨文化傳意”（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指不同文化之間人與人的思想、感情、信息交流。交流可以用語言，也可以用其他代碼。“傳意”亦稱“傳播”或“交際”。

態度、價值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文化分知識文化和行為文化兩大類。知識文化指經濟、政治、地理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這一類文化看得見，摸得着，可以通過書本學習到；行為文化指風俗習慣、思維方法、心理素質、行為方式等，這一類文化是內在的，不容易被人們覺察到，在書本上不常看到，也很難學到，常常被人們忽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從整體上看，都是適合本民族發展需要的，祇有發展階段的不同，沒有優劣之分，對待別的民族文化，儘量採取一種正面的、客觀的態度，尊重別的民族文化。如果採取的態度正確，就會促進不同社群之間的交流；如果不正確，就會妨礙這種交流。

但是，人們常以自己文化社群的觀點來觀察不同文化社群的文化特點，常犯主觀、片面的錯誤，偏見是根深蒂固的。有些人帶有濃厚的種族優越感或文化沙文主義，把別的民族文化貶得一錢不值。有些西方人說，“中國人憨厚，有忍耐性，逆來順受，無可不可，知足，保守，大聲說話，吃得多，虛偽，拐彎抹角，莫名其妙地傻笑……”，又說“中國語言單調，文學缺乏美感，中國人保守，崇尚傳統，痛恨改革，這些特點必然會反映到文學中去……”這種看法顯然帶有民族偏見，缺乏分析。

在跨文化的傳意活動中，如果不熟悉對方的文化，就很容易產生誤解，甚至發生衝突。我在過去三十多年的對外漢語教學中，遇到的這種例子很多。如果你問學生：“你吃了嗎？”學生會誤認為你要請他吃飯；如果你問：“你去哪兒？”學生會誤認為你是特務或是從警察局來的；如果你問學生：“你給誰寫信呀？”“哪兒來的信？”學生會誤認為你干涉別人的私事；如果你對學生說：“天冷了，多穿點衣服！”學生會誤認為你把他當成傻瓜，天冷了還不知道穿衣服，等等。我還發現，學生說話沒有語法錯誤，但覺得洋味十足，甚至會妨礙交際。有一個美國學生愛上了一位廣東小姐，愛屋及烏，於是開始修煉起中國話來，還特別請了一位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女學生教他。這位可愛的老兄見了他的中文教師，總是離不開下面幾句話：

“好想你呀！”

“你真性感！”

“你的兩條腿真漂亮！”

“我愛你！”

上面的話在英語裡是常說的，是很自然的，可是變成漢語就大不相同了，所以使他的中國女教師經常處於很尷尬的境地。在澳門，這種例子也隨處可見。有一次，一個華人公務員跟一個英人公務員有下列對話：

華人：“你的工資是多少？”

英人：“英國人不問這樣的問題。”

華人：“我不是英國人，我是中國人，快說，你的工資是多少？”

英人：“我的工資反映了我的工作情況。”

上面的例子都說明，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又是傳意活動不可缺少的背景。要避免上述情況的發生，就必須有雙文化修養，不但要熟悉本族文化，還要熟悉

別的民族文化，熟悉兩種文化的差異。在多文化社會中，單文化是行不通的。同時也說明，要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必須學習它所承載的文化，否則就是不完全的學習。

澳門文化主要是中國文化和葡國文化，這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互補的，當然也有“撞擊”。中葡兩個社群經過四百多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各自從對方的文化中吸收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作為自己文化的補充，又各自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獨立系統，沒有為對方所同化。兩種文化交融的突出表現是土生葡人的產生。

所謂土生葡人，主要指在澳門出生、具有葡國人血統的葡籍居民，包括葡國人與華人或其他種族人士通婚而生的後代以及長期或數代在澳門生活的葡國人及其後代。有的學者把完全在葡國文化環境中成長的純中國血統的人也算作土生葡人。其中最典型的是中葡混血兒。土生葡人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特殊人類群體，在澳門社會華人社群和葡人社群之間起着不可忽視的橋樑作用。從雙語、雙文化的角度分析，土生葡人有以下特點：

1. 從人種學上看，土生葡人是歐亞混血兒。
2. 從文化學上看，他們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兒。但他們的這兩種文化能力不是相同的，是有強有弱的。
3. 從語言學上看，他們是操雙語者，既操葡語（“父語”），又操粵語（“母語”）。

以單語、單文化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土生葡人，會導致片面性，不可取。

對他們的中文培訓既不同於華人的母語教學，又不同於對葡國人的外語教學，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一種特殊教學，這是世界中文教學中的一個難題。對於這種中文教學的性質、特點和途徑，我已經摸索了快五年了，祇能說有了一些粗淺的體會。

在新時期的澳門，各社群之間的關係，總的說來，還是好的。但也不時地聽到一些彼此之間的誤解和偏見。因此，我們特別討論了單文化的局限性，反覆強調了雙文化修養的重要性。在澳門，華人社群是最大的社群，我們應該進一步去掉“天朝文化中心論”²的不良影響，在宏揚中華文化優良傳統的同時，進一步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秀文化。在歷史上，澳門曾經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就是通過澳門傳到中國的，使我們受益匪淺。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要發展市場經濟，也還是要借鑑西方經驗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例如，它忽視商業，阻礙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內地各行業的排列順序是：工、農、兵、學、商，“商”排在知識分子的後頭。另外，還有“無商不奸”、“商人傷人”的說法。這些都跟儒家思想不無關係。不消除這種流毒，怎麼能發展市場經濟！總之，各社群共同努力，使澳門這個多文化社會健康地發展下去，使澳門的文化特色得以發揚光大。

2. “天朝文化中心論”：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帝王把他們自己稱為“天子”，即“天的兒子”，把他們所建立的朝代稱為“天朝”，意即“受天命而建立的朝代”，把當時的文化稱為“天朝文化”。這種文化把中國視為宇宙的中心，把鄰國視為蠻夷之邦。

二、單語還是雙語？

祇掌握一種語言的人，稱為操單語者或單語人 (monolingual)；掌握兩種語言的人，稱為操雙語者或雙語人 (bilingual)；掌握三種或三種以上語言的人，稱為操多語者或多語人 (multilingual)；一個人、一個地區或國家使用兩種語言，稱為雙語現象或雙語制 (bilingualism)；一個人、一個地區或國家使用三種或三種以上的語言，稱為多語現象或多語制 (multilingualism)。

在當今世上，語言運用的總趨勢是：由單語到雙語，到多語。操單語者越來越少，操雙語、多語者越來越多。到一定的時候，操單語者會寸步難行。近幾十年來，一些國家都十分注意推行雙語、多語政策，實行雙語、多語教育，例如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都是這樣做的。

澳門是個多語社會，長期以來，葡語是政府運作的官方語言；中文雖然不是官方語言，但是使用最廣泛的語言；英語雖然也不是官方語言，但在商貿、旅遊業中很通行。澳門政府順乎世界潮流，由實行單語政策逐漸過渡到實行雙語政策，採取了不少有效措施，終於在1992年1月13日完成了確立中文官方地位的所有法律程序。我是1991年應澳門政府邀請來澳門的，曾任行政暨公職司公共行政培訓中心中文教學顧問，三年之後，又任澳門理工學院中文課程主任至今，參與政府公務員培訓工作，對這方面的情況比較瞭解。澳門政府公務員中文培訓始於1986年，到目前為止，數千名公務員修讀了或正在修讀不同水平的中文課程。現在，僅理工學院就有六十多個中文班，學員一千多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公務員。中文教師四十餘名。據最新統計，1995年全澳參加中文培訓的公務員有2,295人，比1994年增加了98.6%。自1993年開始，政府每年都選派四、五個班的學員去北京學行政暨中文課程，效果極好，頗受學員歡迎。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當然，落實中文官方地位的工作還很艱巨，需要進一步努力。我所接觸的公文多數是葡文的，中、葡雙語的還不多。就是這少量的中文公文，有些也很難懂，須對照葡文才能弄懂意思。我曾經差點兒成了這種公文的受害者，所以記憶猶新。我同時也看到了一個中文教師的責任。

在多語社會中實行雙語、多語政策，要解決一個觀念問題，這就是要放棄單語觀念，樹立雙語、多語觀念。單語觀念在人們頭腦中是根深蒂固的，由單語觀念形成的偏見隨處可見。在美國，一談到雙語和操雙語者，有些祇操英語的美國人就聯想到美國境內那些英語講得不好的少數民族學生。在澳門，一談起土生葡人，有些葡國人就說，他們的葡語不好；而有些華人就說，他們的廣東話不行。剛來澳門時，我不會講廣東話，有時祇好講外語。有一次在飯館裡跟一個朋友講外語，在我們旁邊兒的一位老人笑話我們說：“唐人講番話！”這些都是單語觀念在作怪。如果我們以雙語的觀點看問題，那麼就會發現，土生葡人有葡國人沒有的長處，那就是他會講廣東話，熟悉當地中國文化，特別是行為文化；土生葡人有華人沒有的長處，那就是他會講葡語，熟悉葡國文化。土生葡人也有短處，例如他不會讀寫中文，這一點需要補課。這樣看問題就比較全面。我們應該使自己成為操雙語者、甚至操多語者。葡國人要學習中文，華人要學習葡語。澳門是個國際城市，英語的學習也不能放鬆。我初來澳門時，由於合作的同事大都是葡國專業人員，所以我首先抓了葡語學習，學了整整一年。在課堂上教中文用一點兒葡語，葡國學員高興極了。由於在生活中需要跟本地華

人打交道，所以我也學了一點兒廣東話。說來很有趣，我通過英語學習廣東話，又通過廣東話學習葡語。我在一個本地朋友的紀念冊上寫了下面的贈言：

使用多語是現代生活方式。

O uso de diversas línguas é um modo de vida nos tempos modernos.

Multilingualism is a way of life in modern times.

以上邊嘅話同××共勉。

以上的贈言是澳門“四語兩文”的寫照。

澳門這個多語環境跟香港一樣，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這個多語環境裡，中文、葡語、英語相互接觸、相互影響，相互吸收、補充，發展自己。拿中文來說，它從外語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東西。豐富了自己，使自己更富有生命力，為進一步走向世界創造了條件。這裡不全面論述中文跟外語接觸中所發生的變化，祇以外來詞為例作簡單說明。在港澳地區，中文從外語中借用了大量的外來詞，其中反映新概念、新術語等新生事物的詞佔了很大的比重。外來詞的借用方式也多種多樣，主要有下列幾種：

1. 音譯，如：鐳射 (laser)、可樂 (cola)、比薩 (pizza)、巴士 (bus)、的士 (taxi)、波 (ball)、貼士 (tips)、甫士 (pose)、拜拜 (bye-by)、媽咪 (mammy)、爹哋 (daddy)、隱弗 (keep fit)、波士 (boss)、馬介休 (bacalhau)、沙丁 (sardinha)、士多 (store)、多士 (toast)、菲林 (film)、杯葛 (boycott) 等。

2. 意譯，如：微波爐 (microwave oven)、超級市場 (super market)、下午茶 (afternoon tea)、購物中心 (shopping centre)、硬碟 (hard disk)、軟體 (software)、傳真 (facsimile)、同步翻譯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一石二鳥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等。

3. 音譯加意譯，如：保齡球 (bowling)、卡式帶 (cassette)、奇異果 (kiwi)、愛滋病 (AIDS)、雙性戀 (bi-sexual)、牛仔褲 (jeans) 等。

4. 半音譯、半原文，如：卡拉OK (カラOK)、T恤 (T-shirt) 等。

5. 原文略加本地化，如：阿Sir (Sir) 等。

6. 直接借用原文，如：bye-by、book (用動詞“訂”之意)、migo (葡語 amigo, 朋友)、folga (葡語, 休息)、walkman (隨身聽)、call (如“我call你”)、morning call (酒店用語)、cantina (賣飲料、小吃的小餐室或餐檯)、O.T (加班, 如“我做O.T.”)、CD、CT、D.J. (節目主持人)、N.G. (再來一次) 等。

外來詞是一種誇文化現象，它反映了兩種文化的融合。它的存亡取決於中文交際的需要，它的改造加工取決於中文本身和它所負載的文化性質和特點。總之，外來詞使中文更富有表現力，更符合新時代的要求。所以我們說，外語也是豐富中文的源泉之一。有些外來詞已進入了普通話，並且有了擴展，如“巴士”又擴展為“大巴”

“中巴” “小巴”等，可見它的生命力有多強。我們一些語言學家，思想比較保守，常常落在語言發展的後頭。當一種新的語言現象出現之後，指責的多，支持的少。大家還記得，當“卡拉OK”剛出現的時候，有多少語言學家批評它“不倫不

類”，拒絕接受，可是它不管你反對不反對，“賴”着不走了，而且“活”得很好。又例如：七十年代，“你好”這個問候語在內地剛流行的時候，有的老語言學家就批評說：“這是哪個華僑從外國帶回來的，中國人根本就不這樣說，除非兄弟兩個吵架，才說，‘你好，我不好’！”可是現在“你好”已廣泛使用。語言是約定俗成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澳門是一個很難得的語言實驗場地，它比內地先走了一步，有許多有趣的語言現象首先在這裡出現，然後才在內地出現。保留這塊語言實驗場地，不但有利於保留澳門的文化特色，而且也有利於制訂科學的語言文字規劃和正確的方針政策。雙語總是比單語好，即使在世界大同之後，也不會祇有一種統一的語言，這既不太可能，也沒有必要。語言代表一個人類群體、一個民族，歧視這種語言，就意味着歧視這個人類群體、這個民族。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有一句名言：“葡萄牙語就是我的祖國。”其含義是極為深刻的。各民族語言都是平等的，沒有優劣之分。語言對每一個民族來說都是神聖的。有些國家和地區，常常發生民族衝突，其中有些衝突是語言衝突，是語言沙文主義和單語政策造成的惡果，教訓是很慘痛的。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經濟現象。語言的發展有一定的客觀規律，受經濟發展制約。十六世紀，葡語在亞非沿海地區為主要的商貿語言，這與當時葡國的海上霸權地位有關；十七世紀以後，英語取而代之，逐漸成為國際性語言，這與英、美等英語國家的國力有關。在澳門，中文和葡語都是官方語言。由於歷史的原因，葡語一直是頂層語言，在政治上佔優勢，是政府行政運作的主要語言。1992年，中文官方地位確立之後，這種狀況開始有些變化。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葡語仍是官方語言，但是它的使用範圍會根據社會交際的實際需要而有所調整。它主要用於行政運作、文化交流和學術研究等。在過去四百多年的歷史上，葡語從未被當地華人社群作為日常交際的語言而接受，今後也不會被接受。葡國政府想在澳門普及葡語，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太現實。有些葡國朋友常說：“推行得太遲了！”推行得早是不是就一定能普及？比較實際的做法應該是培養少量高級葡語人材，建立拉丁文化（包括葡國文化）研究機構，以便使葡國文化、葡語長期保留下去。葡國文化和葡語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中文的官方地位會進一步落實，1999年以後會成為主要的官方語言，英語的市場價值也在迅速上升，這也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三、民族共同語還是方言？

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是全國通用的語言，也是中國的官方語言。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五十六個民族，其中漢族佔全國總人口的94%。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中國又是一個方言分歧很大的國家，漢語內部粗分為八大方言，細分數以千百計，數目多，差別大，彼此很難溝通，祇好求助於翻譯或文字。這種地域性方言是人們長期隔絕而造成的。從全局來講，方言具有很大的離心性和局限性，對社會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跟方言相對的是民族共同語。顧名思義，民族共同語就是一個民族共同使用的語言。漢民族的共同語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普通話是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不是人為的、硬性規定的，這種共同語在兩千多年前稱為“雅言”，漢代稱為“通語”，宋代以後稱為“官話”，民國時期稱為“國語”，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臺灣仍稱為“國語”

“普通話”不是“普普通通的話”，而是“普遍通用的話”。普通話不但不受漢語方言的限制，而且也是全國各民族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標準語，是名副其實的“一國之語”。把全國最通用的普通話定為官方語言，也就是政府公用語言，是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而考慮的，絲毫沒有歧視各民族本身的語言文字或方言的意味。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多元民族國家，都是這樣做的，而且多數都成為發達國家。不久前，法國宣佈法語是官方語言；在實行過渡性雙語制的美國，有人建議要宣佈英語是官方語言。諸如此類的事例都是意味深長的。

隨着中國進入聯合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普通話的國際地位也逐步提高了。普通話（不是別的漢語方言）已成為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根據西方學者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漸轉向亞太地區，所以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漢語熱”，連在歐美居住的華人，也在積極創造機會，使自己的子女學好普通話，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保持中華文化傳統，而更重要的是為了讓子女以後能在跟中國有經濟、文化聯繫的機構中找到工作。

漢語詞語以拼音的形式進入外語的，是有限的，大家最熟悉的有tea（茶）、fongsui（風水）、yin（陰）、yang（陽）、kowitz（叩頭）。有趣的是，Putonghua（普通話）也進入了外語，成為外語中的一個很常用的詞，可見它的影響之大。

總之，普通話的民族共同語地位已經確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逐漸大起來。它的地位和職能是任何方言所無法取代的。民族共同語是高層語言，而方言是低層語言。前者用於正式場合，而後者用於非正式場合。不少人都談到“普通話南下，粵語北上”，但很明顯，“普通話南下”是主流。

港澳地區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文化社區，具有一些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特點。粵語是現代八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在五千萬以上。它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古代漢語的音韻系統，有一部分特殊的語法格式，有一套自己的詞語（包括文言詞、地方詞和外來詞），有一批特有的漢字。一般來說，在一個多語社會裡，民族共同語是高層語言，方言是低層語言，而在港澳地區，粵語也起了高層語言的作用，用於政府行政運作、法院案件審理和學校教育等。粵語是一種強勢方言，背後有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持，對普通話影響較大。許多外來詞通過粵語這個中介進入了普通話，一些地方詞語也進入了普通話。說粵語是豐富普通話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恰如其份的。目前，就口語而言，還是以粵語為主，以普通話為次。今後的發展趨勢是：普通話的使用範圍會逐漸擴大，由書面語到口語，由高層（正式）到低層（非正式）。粵語和普通話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關係，不是互相排斥的。即使普通話在港澳地區普及之後，粵語也不會消失。港澳地區一定會順乎世界潮流，沿着多語社會的路向而發展下去，不可能變成一個單語社會。

我剛來澳門時，的確感到本地區的人學習普通話不太熱心，還感覺不到學習普通話的必要性。原因很多，但我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方言情意結在作怪。語言學上有一個重要概念，叫做“語言自我感”（language ego），就是一個人跟自己所習得的母語認同，粵方言情意結正是這種“語言自我感”的具體體現。近幾十年來，珠江三

角洲的經濟發展很快，以經濟實力為後盾的粵語也發展起來了，並且正在北上。這種情形使不少人產生粵語優越感，加深了“語言自我感”。應該承認，一個人同自己的母語認同，熱愛自己的語言，是很自然的。但是也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過分的語言自我感產生一種保守性，抗拒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或方言。港澳地區的人語言自我感的表現隨處可見，如有些人說：“粵語生動、形象，詞匯豐富，連粗口也有味道；而普通話是人造語言，詞匯貧乏，沒有味道！”有些人說：“廣東話也是中國話，既然會說廣東話，就沒有必要學普通話了！”“我也不想當京片子！”還有些人說：“我無求於內地，而內地有求於我，我不需要學習普通話，而他們倒需要學習廣東話！”“我以後的發展方向是海外，外語比普通話更重要，我教我孩子把重點放在外語上，普通話學不學無所謂！”“普通話還不容易？廣東話講歪一點兒不就是普通話了嗎？”

近幾年來，上述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變，在澳門出現了新的普通話熱潮，我作為普通話課程的組織者之一，親身感受到了這一點。澳門人學習普通話熱潮的出現是有原因的。首先，澳門人認識到世界的潮流是雙語、多語，中國人講外語被譏諷為“唐人講鬼話”的觀點和心態已經過時，而“粵人講粵語”“臺人講臺語”的說法，如果強調過分，也失之偏頗，不合時代潮流。澳門人不會講普通話，跟澳門這個國際城市不相稱。澳門人要面向全中國、全世界。其次，澳門經濟要持續發展，不但要跟海外聯繫，而且要跟內地聯繫；不但要跟廣東粵語區聯繫，而且要跟內地不同方言區聯繫。同內地十幾億人打交道，不會普通話，就會產生“雞同鴨講”的情形。誰不學普通話，誰以後的不方便之處就多。誰能保證自己永遠不會去內地？誰能保證自己的後代不會去大陸或臺灣上大學、公幹？第三，隨着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普通話的使用範圍會逐漸由書面擴大到口頭。澳門人說的是粵語，寫的卻是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習普通話，有利於對書面語的理解、用書面語寫作和書面語的規範化，逐漸做到由“我手寫他口”變為“我手寫我口”。第四，對個人來說，會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標誌着語言能力的增強和溝通範圍的擴大，自然具有較大的工作適應性。

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語言是要規範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規範的標準首先是看其能否滿足社會交際的需要，達到有效的交際目的；其次，看其是否合乎語言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特點。規範的標準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語言文字學家的責任是及時總結人民群眾運用語言的新鮮經驗，系統整理、加工，提出合理化建議。引導大家正確地使用語言，而不是拘泥於一些舊的個人經驗，站在他們的後頭，指責他們。我很贊成詹伯慧教授說的：“要作導遊，不要作警察。”當前，在港澳地區，規範工作的首先任務是書面語的規範，政府公文、法律規章和報刊新聞等正式文字應該是規範的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白話文，華洋夾雜或土洋古混合等現象應逐步消除。非正式文字可根據情況而定，不必一刀切。

四、繁體字還是簡體字？

在內地，簡體字使用了二十多年了，人們都已經習慣了。而在港澳地區和臺灣，人們仍使用繁體字，對內地使用的簡體字有不同看法。如何處理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問題，許多專家都談了很好的意見，我不再重複。我在《一本學習漢字的好書》中比較具體地談了我對漢字研究的一些看法，這裡也不再重複，祇簡要地重申以下幾點：

1. 對漢字的看法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去說漢字是世界上最落後的文字，要中國人就不要漢字；現在又說漢字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字，比拼音文字還先進，將來一定會成為世界性文字。“複腦文字”³ 祇是一種假說，並沒有得到證實。我們祇能說，漢字是一種語素文字⁴，它反映了漢語的本質特點。漢字難認、難寫是世界公認的。“Para mim é chinês” 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2. 漢字要簡化，這是漢字自身發展的規律。俗體是對正體的簡化（如頭→头），草書是對楷書的簡化（如書→书），而行書又是取乎其中的。漢字不是越繁越好，不然的話，我們都使用象形文字得了。當然，文字的統一要以國家的統一為條件，秦統一六國後才有“書同文”。簡化的過程是漫長的，漸進的。一種新字體的出現，不是馬上取代已有的字體，而是形成長期並存的局面。簡化始終在漢字形體結構內進行，不能破壞漢字的結構體系。

3. 繁體字和簡體字共存是現實。要承認現實，尊重現實，通過協商討論達到共識。繁體字和簡體字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已會繁體字，再學簡體字，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情，何況又是社會需要。一味排斥簡體字，把簡體字當作錯別字對待，也失之偏頗。內地人到港澳地區工作也要學會使用繁體字。簡體字我用了二十多年了，現在改為用繁體字，難免也夾雜着簡體字。在兩種觀點針鋒相對的情況下，程祥徽教授提出“繁簡由之”的看法。我有一個基本的哲學思想，就是：真理點常常在兩個極端之間，並且是動態的。因此，我認為，程祥徽教授的看法是比較實際的，可行的。

3. “複腦文字”：據日本、美國一些學者的研究，拼音文字祇以語音編碼方式輸入左腦半球，因而是一種“單腦文字”；而漢字集形、音、義於一體，表意功能強，以語音編碼方式輸入左腦半球，又以圖形編碼方式輸入右腦半球，因而是一種“複腦文字”。這種假設尚未得到證實。

4. “語素文字”：“語素”（morpheme）是最小的語音、語義結合體，比如漢語中的“人”、“來”、“去”、“好”、“語”、“習”、“衣”等都是語素。在漢語中，絕大多數語素都是一個音節，用一個漢字代表，因而稱為“語素文字”或“語素音節文字”（morphosyllabic writing system）。

